

【英】迈克尔·伯利◎著 李广才◎译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国

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



权威的单卷本第三帝国史巨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英】迈克尔·伯利◎著 李广才◎译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国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 / (英)伯利著;李广才译.--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54-8143-6

I. ①第… II. ①伯… ②李…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
国—史料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234号

THE THIRD REICH

Copyright©2000,Michael Burleigh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陈俊帆 张韵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5.5 插页:8页

版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418千字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纳粹主义、政治宗教和极权主义	1
1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年 异端的跋涉 信仰者之中 大规模失业 直面惨败	15 34 44 57 69
2	“贝克小姐，小心您的头， 您在摇头”：法治的终结 警察的舞会 月之暗面 优雅国度	71 76 87 91
3	更换桥梁：新的时代，新的人 自以为是的政治 褐色崇拜和基督徒 入侵与受害	99 104 110 121
4	德国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 1933—1939 年 大迫害	128 156
5	“清除昨日思维”： 人种改良和“安乐死” 医学化大规模谋杀	170 192

6	“丹麦人不是波兰人，而是条顿人”： 欧洲的被占与通敌，1939—1943 年 东欧、西欧和巴尔干	208 216
7	战线过长的闪击战？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和占领， 1941—1943 年 战争外的罪行 其他人的战争	246 259 270
8	“铁血时代的铁扫帚”： 对犹太人发动的种族战争 驱逐和遣送 针对苏联犹太人展开的幻象 幻象尽显：全欧范围的“大屠杀”	291 292 306 324
9	“只要上帝愿意，扫把也可当枪使”： 德国境内的抵抗，1933—1945 年 左翼复苏，重新结盟 “充满原始活力”的激励和右派 犹豫不决的将军们 未捷身死的上校们	346 346 349 350 357
10	“在电影中饰演角色”： 战争与和平，1943—1948 年 美国世纪 苏联人来了 炸弹之下 神话的诞生 缔造和平	366 366 375 379 386 394

引言 “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纳粹主义、政治宗教和极权主义

一小撮德国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选择放弃他们个人与生俱来的批评本能，而去追寻一种建立于信念、希望、仇恨，以及寻求他们自己种族与民族利益的、情绪化的集体自尊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本书要讲述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发生之事。因此，这是一个具有 20 世纪特征的事件。

本书涉及的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道德上逐渐以致几乎彻底的崩溃，其人民放弃了为自己着想这一负担，反而热衷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翻版部落文化中的手鼓的擂打。他们相信了恶人，因为恶人做出了承诺，要带领他们大步跃入宏伟的未来，同时使德国本国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在暴力之下都迎刃而解。这给德国、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造成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远不及给欧洲犹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被肆意大规模屠戮，今天我们公正地认识到这是现代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

从局部看，德国遭遇了其在 20 世纪中的第二次重大惨败。用德国公民的生命为大众的愚昧和傲慢野心付出了代价，不管是由于他们直接犯下了恐怖罪行，还是由于道德上的冷漠与无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他民族也受制于对暴力罪行的妥协、被占领下的屈辱和恐惧，还有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而对欧洲犹太人而言则是大屠杀。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盟国的文化和生产资源都不得不倾斜用于击退和摧毁一个仇视文明、自由、人道、仁爱和容忍性价值观的政权，而这些价值观恰是我们所珍视的。敌托邦式的解决德国多重问题的应急之计，最终导致了约 5000 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欧洲用了半个世纪才从战争后遗症中完全康复，因为疗伤与和解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事关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之外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已被许多以欧洲为研究视角的德国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无可厚非地全神贯注于本国的历史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让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学学术议程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德国，不论德国的学者为了解和理解他们当代史中这一晦暗的时期做出过多大贡献，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虽然本书对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犯下的终极恐怖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这不仅仅集

中于大规模屠杀，此事也许已经并不那么神秘。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一主题的部分兴趣所在。作者声言自己对参加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个人背后动机并无特殊的见解，自从人类历史肇端以来，人们对这种行为已经有了充分的解说。古典文献、《圣经》、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可以当作当代史学家的创作指南。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进入主题之前就规避了过度宏大的预期。

事实上，《第三帝国》是对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长期内，更加微妙的道德崩溃与转型的描述，敏锐的观察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这种崩溃与转型的后果。群众受精英人士中一小撮无良自私者的鼓动，他们逆流而上，罔顾善良真理和疑惑，信任了希特勒这个跳梁小丑，当他发现他对世界的仇恨可以无限推广的时候，他自身可怜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历史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曾将这些群众称作“邪恶暴民”。遭受惨败和持续危机折磨的许多德国人，从希特勒精心选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中也看到了他们理想中的自身形象。正如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在1944年写到的：“人民在做梦，预言者告诉他们梦见了什么。”我之所以说“许多德国人”，是因为还有别的人，如海登、弗格林，他们的本能、人性或见识都禁止他们心存疑虑，换言之，他们的核心政治或宗教观都阻止他们落入新野蛮状态的深渊。他们二人都死于流亡途中，分别在马里兰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但他们代表着数不清的其他人，被驱赶到布鲁克林、佛罗里达或土耳其。这些人的存在让那些信任希特勒的人们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其无以复加的愚昧，尽管这会让人们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德国人。

本书并非首次从政治宗教或极权主义角度研究纳粹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两种研究方式再度成为时尚，其指导思想更多地得益于许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家，而非普通的研究相关主题的史学家之流。因此，书中重申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即试图去辨别那些有关希特勒是否和其侄女有染，是否喜爱他养的狗，或是否为温莎公爵及夫人做过计划等表面叙述底层所蕴含的纳粹现象，而海登和弗格林却对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不论多么不合时宜，严肃的学术问题会完全埋在病态矫饰的雪崩之下，而由此流传的平常琐事在六七十年之后仍然不见减少，此事本身就日益为高深的当代观察家带来不安。我们现在从对我们自身时代与文化的思考中，转向使本书内容、核心焦点及结构成型的思想观点的探讨。

古代经典著作作为我们造就了许多政治语汇，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民主、专制、独裁和暴政等术语，而这些术语有时却不足以描述某些具有挑战性的新情况，促使评论家搜索新词，有时无功而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尝试尽力去描述北美民主时，就遇到了这一困难：

那么，我认为民主国家面临的压迫类型，不同于过去任何时候曾存在过的压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在其记忆中无法找到这种压迫的原型。我要寻找一个能够准确表达我对此形成的全部思想的词汇，却无法找到；“专制”和“暴政”都不合适：该事物是新的，既然我无法为其命名，我就必须去定义它。

20 世纪 20—30 年代，西、南欧和苏联发生着巨大变化，同时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思考。

仅仅过去十余年之后，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人们也开始了类似的思考。例如，1934 年 7 月 14 日，德累斯顿语文学家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埃娃讨论了屋外扩音器中轰鸣传来的希特勒的演说。克伦佩雷尔写道：“这是疯狂布道者的声音。埃娃说：像约翰·范·莱登。我说：像里恩佐。”他选择的是瓦格纳早期歌剧的一个主人公。

埃娃·克伦佩雷尔并非唯一一个将希特勒与 16 世纪的再浸礼教派对比的人。另一位日记体作家，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的遁世贵族弗雷德里希·雷克-马勒策文也进行过同样的比较，他于 1937 年对希特勒作了一番描写，将之描绘为 16 世纪在明斯特施行恐怖统治的再浸礼教派领袖约翰·博克尔松。其著作的副题为《大众疯狂史》。诸如此类的当代声音会在本书内反复回响，因为这些声音所表现的眼界和见识有时超越了那些以方法论教条或理论见长，而缺乏时代精神的当代史学家和评论家。与宗教类比也打动了那些拥有比阴郁的雷克-马勒策文更平静的世俗世界观的人们。1937 年 4 月，一位匿名作者在布拉格为流放的社民党领袖编制了一份非同凡响的报告，写到了纳粹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紧随报道过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早期作家，该报告作者直白地将纳粹主义比作世俗化的宗教。他称结果会造就“教会国家”或“反教会国家”，带有自身毫不宽容的教条、牧师、神圣仪式，以及完全地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术语体系，并要求其追随者不动摇地彻底奉献。只有默许还不够；这种政权要求其民众不断地给予肯定，并表现出激情。本“引言”及全书中都将探讨此类观点中的某些内容，但是该报告的作者还引导我们去关注从一战到二战后西德民主建设的其他内容。

该报告的作者为纳粹所施行的道德转型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隐喻，这一观念在现代历史创作中几乎仍付阙如，这体现着社会科学不进行价值判断的观点，仿佛道德就是说教，而并非天然存在于人类状况和哲学对其的反映之中。该报告作者将纳粹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的道德转型比作建造一座铁路桥。工程师们无法仅仅摧毁现存的框架，因为这会对铁路交通造成冲击；相反，他们缓慢地更换每个螺丝，每根大梁和钢轨，工作进行的同时，飞驰的列车上的乘客不会将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移开，然而终

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旧桥不在了，一座崭新的大桥早已取而代之。纳粹“道德”出现之前，从未出现过如此连贯、紧凑的体系来抗衡犹太教—基督教道德或实用主义道德，而这事实上却是缺乏普适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然而其中的暗示也令人忧心忡忡。

将政治运动看作具有礼拜仪式、仿神学和善与恶的类宗教或代宗教，由来已久。较早之前，托克维尔曾将法国革命比作“宗教复苏”，称之为“一种宗教”；它“如同伊斯兰教一样，有其信徒、战士和殉道者，踏平了整个世界”。由于对立的原因，罗伯斯庇尔也同意这种观点。在试图让其信徒中的怀疑者和灭亡论者绝缘革命时，他写道：“能够消除或取代这种[怀疑论]有害本能的，能够弥补人类权威不足的，就是印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宗教本能，由高于人类的力量赐予人类的道德准则进行裁决。”这并非政治无法企及的煽动群众热情的极端伎俩，更不是要篡夺神圣话语权、仪式权以提高士气。因为这些雕虫小技简直微不足道，因为毕竟在发达民主国家和发达专制政权中，说教和自以为是的正义都已司空见惯。然而，这反映了一种观念，认为上天已降下某种特别的社会秩序，以使幸福常驻世间。任何反对这种信念的人不仅有错，而且参与了魔鬼的阴谋。这种指责发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内部，及两者之间最初的冲突，撒旦开始只是试探人类的天使，后转型为邪恶的化身，潜伏于任何异端的表象之下。反对者不仅是受到了误导，因而无法劝说，只能灭绝，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生存。

那些根本没有民主或其民主令人生疑的帝国与国家，常常披上宗教的外衣，这让从那不勒斯到波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民族主义者颇为懊恼，因为他们眼中的民族国家正是获得日常的类宗教式肯定的国家。集中关注民族与国家或某种价值观的公民宗教，曾在19世纪的欧洲和自诩为现代以色列的北美十分普遍。它们夸张的实体存在点缀着许多欧洲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一点任何曾在罗马市中心登上犹如婚礼蛋糕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碑的人都会认可。当时，如意大利的统一日和德国的色当节等民族庆典日也流行一时。从本质上看，这些纪念碑与纪念日对于救世主式民族主义支持者而言，显得空洞而缺乏灵魂，他们需要让人民永葆高涨的热情；他们还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应包含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代表谁的利益方面漏洞百出。被排除在外的最大群体——劳工，全部或部分地组织起工会或政党。劳工自身也形成了另类的狂热崇拜仪式，而他们所坚守的意识形态信条却是激进地反宗教的。处于正式公民宗教边缘地带的人民由伟大善良人物支配，但他们也敌视有组织的劳工，常常构成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潜在力量。

一战，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灾难，为20世纪大多数的恐怖埋下伏笔。本书从一战开始，埃米尔·涂尔干认为它所造成的情感波动如同宗教体验中的必要过程。大战及其引发的失常后果加强了政治学中的类宗教学派的复兴，在极端危机时代展现出最大的感召力，正如中世纪的千年至福说或审判日前需要等待千年的信仰，会在社会大变

动、大紊乱中兴盛一时一样。死者悲痛欲绝的亲人会来到每个城市或村庄矗立的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些纪念碑用金石记述了过去的英雄史诗。真正无法表达哀思的人们会在精神世界中寻找答案，观看照片贩子“捕捉”到胶片上的行进中的士兵们犹如幽灵般的影像。这些幻象和诱惑在政治上都有其同类。一战拖垮了自由文明，而恰是自由文明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这就使某些人逃离战争的混乱和恐怖，转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以继续 1789 年未能实现的承诺。虽然欧洲的极端保守主义使一战提前爆发，但战争、混乱和革命的组合，也在大量的死亡之中延续了生命，毕竟新一代蛊惑人心的救世主们，残暴、自觉，能操纵别人，却下定决心不去重蹈前人的覆辙。

这些虚伪救世主最初的使徒只是一伙亡命之徒，但在真正冲击到人们存在感的本体论危机的影响之下，他们迅速在人民大众中扩展，为他们提供鼓舞的是法国革命以来所未见的强烈情感投入，还有在战争或危机中才会出现的间歇性高涨的民族热情。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主义者，及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较为次要的模仿者们，都支持信仰的政治，并将他们的偶像、扈从符号和卐字供奉在已经部分建成的民族主义神坛上，并使用大量的爱国语言表达其诡异的目标。传统主义者可以被吸引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他们相当熟悉的东西，标新立异者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吸引而来，同样被吸引来的还有那些已将暴力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怀旧念想，或有洗刷罪孽的伪哲学的人们。

战争阵亡者们悲戚的墓园文化，已转变为好战子遗们的狂热崇拜，其中一战的被难者们与极右翼势力自己恐怖暴行导致的伤亡者无缝衔接，然后这些死者就会在宏大的仪式上，以严整的步伐走入永恒的荣光。其中留下的矛盾无人评说，无人探究。青年的病态取代了哀伤。令人生畏的大众伤感，加上愤怒、恐惧、仇恨和自怜，取代了寻常的正派政治、实用主义、财富和理智，以及国家命运应由独立个人做出的主权判断来决定的思想。对于本能的信念、信仰、情感和服从，带来了辩论、怀疑和妥协。人们情愿去屈从于群体或群众情感，包括昭然若揭的肮脏丑恶的种群心态。在虔诚的信仰者中，一个春天永驻、遍地英雄和恶魔、充满火与剑的神秘世界——保育园中的幻想，取代了现实；更确切地说，是侵犯了现实，让犹太人、斯拉夫人、资本家和富农的野蛮形象占尽了人们的想象力。这是儿童政治游戏，而成人却乐此不疲，他们厌倦了战后平淡的自由民主氛围，百无聊赖，因此即使要他们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他们也愿意将英雄姿态和英雄政治当作一种剧场特技加以接受。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这种政治形式十分现代，强调形象和民族感情，因为欧洲的煽动家们都狡猾地知道他们制造群众信仰所需要的操纵技巧，他们知道群众、旗帜、歌曲、符号和色彩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这些人是政治艺术家。

1922 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 1933 年德国纳粹政权的出现，标志着对这些政治宗

教严肃思索的开始，也正好结束了其存在的传闻性直觉。关注此事的思想家常常是那些对用唯物观解释政治现象十分不满的人们，或是那些认真对待思想的人们，他们不认为思想从属于“事实”或所谓的“更深层”社会经济结构，仔细探究之下，这种结构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正如罗素写道的：“要了解布尔什维主义，仅仅知道事实是不够的；培养新精神的共鸣或付出想象很有必要。”

20世纪最早倡导将政治运动看作宗教的学者有德国天主教徒瓦尔德马·古里安（1902—1954年）和埃里克·弗格林（1901—1985年），他们于1937年和1938年相继逃离德国，分别来到圣母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执教；法国伟大的自由保守派思想家雷蒙·阿龙（1905—1983年）；以及雅各布·塔尔蒙（1916—1980年），他是工作于英国和以色列的波兰籍犹太人，就这些问题曾写过重要但存在缺陷的三部著作。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对于弗格林和阿龙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以色列境外，一定年龄的学术人士了解塔尔蒙，而古里安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尽管他写作了不少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佳作。

其中的某些思想家，各自或多或少地不愿被看作“保守派”，他们亲身体验过极权主义现实的经历。拿弗格林来说，他于1937年发表了两部著作：《知识历史中的民族思想》和《民族与国家》，但这两部书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因为其中不仅强调了纳粹民族理论在科学上的不足，还将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在更广阔层面上精神抑郁的症状。他的下一部著作《政治宗教》，将纳粹主义描绘成现代固有的异端，即就在此时此地承诺救赎；该书甫一印成，就被盖世太保收缴。盖世太保开始到弗格林家中骚扰他和妻子，没收了他收藏的《共产党宣言》等违禁书籍，但当他提议是否也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并收走时，却被盖世太保婉拒；他后来不无讽刺地提到，他的提议只是反映了他广泛的学术兴趣所在。盖世太保试图没收他的护照，又在他的屋外安插一名暗探时，弗格林决定逃到瑞士，进而逃往美国。这些人并非是在论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同于宗教，因为它们都缺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深度，而且它们集中关注的也不是超越宇宙的存在，泥潭中也有水，但它不是海洋。弗格林认为所有这些政治运动都是因为世界上缺乏宗教而造成的后果；他认为世界已经腐朽了，类似于此时此地救赎的基督教异端思想，融合了后启蒙时代社会转型的教条而大行其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未将“君权神授”作为其政治使命最终合法性的来源。然而，政治宗教都强调“现世”，这也是其与旧基督教的区别特征之一，但政治宗教试图取代基督教的价值观，也与教会进行各种交易。它们的功能也与一般宗教不同，除非人们将这些政治宗教激发的热情等同于对足球队的崇拜。事实上，它们夸张地模仿了宗教信仰的根本模式，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被神圣化，如阶级、民族或种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上帝而成为大众热情膜拜的对

象。一个统一的国家，清除了一切种族或政治污染，在外部看来毫无道德缺陷，变成聚集在一起的衷心信仰者，在倾听新“领袖”动情的有力演说；一名当时的意大利人曾将此描述为“对人类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这种思考方式不但从未没落，反而显现了日益强大的迹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诺曼·科恩、乔治·莫斯、詹姆斯·比林顿、詹姆斯·罗兹、汉斯-约阿希姆·加姆、乌里尔·塔尔和克劳斯·冯东等人都借此展开了重要的研究，而“信仰政治”的普遍属性得到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的关注。塔尔英年早逝，莫斯活到暮年，他们两人的作品都对本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政治宗教的研究兴趣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复兴，索尔·弗里兰德、菲利普·伯林、埃米利奥·让蒂勒、迈克尔·利、克劳斯-埃克哈德·贝尔施、汉斯·迈尔、尤里乌斯·舍普斯和让-皮埃尔·西龙璠等范围广泛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政治宗教也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虽然他们的全球视角常常淡化了有意义的比较。不幸的是，对政治非理性的研究变得过于理性，也可以说是受到了貌似理性的解说方式的欺骗，这一点不乏先例。

和海量的其他历史文献有其分类一样，关于政治宗教的历史文献也有其分工。一类研究涉及的是各类政权如何利用神圣语言和仪式，即使它们自身都对宗教深恶痛绝。在这一层面上这样看待纳粹主义最容易理解和把握。最新出现的一类研究课题研究对象是政治宗教对道德产生的作用，虽然摒弃造福人类数千年的价值观的后果无一例外都是灾难性的，但仍有某些人，因无法消除阶级或种族印痕，不能被改造成新人，而被抛弃或谋杀。这里史学家使用了传统的历史编年学，因为道德气候有着模糊的边界，生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或 80 年代的人们与其生活在 1914—1918 年或 30 年代的先辈们一样，都会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评价。学者们对各个时代中个人的抉择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为海德格尔、海森堡或施佩尔等人撰写了引人入胜的新传。人们还对纳粹统治下人种改良对医疗道德的影响很感兴趣，纳粹在东线战场上将普通人转变为半人的捕食者；对慈善的利用、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都引发了人们的兴趣，纳粹利用这些方式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激励他们，回报他们。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极权意识形态本身也遮蔽了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因为一旦权力被送入精英集团手中，不管是基于所谓的天然优越性还是只有他们能够代表劳苦大众的说法，那么拯救不久就会来到。

纳粹意识形态从民族本体论危机出发发展开救赎，这种危机吸引纳粹就如同鲜血吸引食人鲨一样，本书第一章试图表现这一绝望与失望的气候，以表明为什么是纳粹主义运动，而不是更为传统的政党引得民众趋之若鹜。当时德国千疮百孔，隔阂日深，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纳粹此时提出的极具包容性的政策使这个浸透着物质利益的社

会中的人们似乎感受到一种崇高理想，一种民族使命。而汉娜·阿伦特所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第六感”为表象之下“真正”发生的畸变提供了简明的诊断，由此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是潜伏的力量造成了德国战后的动荡。所有人都要做的就是信仰上定量飞跃；统一一致的国民自信是解决一切世俗问题的法宝。正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曾说过的，信念真正具有移山之力。

虽然纳粹自欺欺人地使用具有实用理想的语言，也能够进行精确的算计，但它已踏足条顿神话的非理性黑暗世界之中，在这里人们从正面看待英雄末路，这里的赌注是一切，也可能是一无所有一—国家与民族的救赎或毁灭。

纳粹意识形态具有宗教内容的说法似乎遭遇了事实的抵触。1938年9月希特勒指责了身为党卫军首领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即将成为该党意识形态领导人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因为他们试图将纳粹主义解说成一种宗教崇拜。希特勒提醒他们：

纳粹主义是基于最广博的知识及其精神表现的冷静的、高度理性的研究现实的途径……纳粹主义运动不是狂热崇拜运动；而是一种脱胎于纯种族本性的思考形成的民众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不提倡神秘主义的崇拜，其目标是培养并带领由其血统决定命运的民族。

希特勒担心羽翼丰满的宗教会独立于他发号施令，而他必须是一切教条权威的唯一来源，他还担心这会激怒基督教会，使其放弃对政权的支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会认为该政权在魏玛共和国烟消云散后一直致力于恢复权威与道德。事实上，假如纳粹取得持久胜利，那么他们所支持的一切将注定被毁灭。但希特勒也承认，纳粹主义不只是实用生物学，而且表现了上帝揭示的永恒科学法则，反过来也充满了神圣的属性。这里的科学和属性再次被施加了魔法：简洁与活力相容，宗教与科学相容，青年病态与生机论相容。纳粹的种族主义并非只是伪科学走火入魔的产物，更不必说可以指控整体“科学”的事物了，因为如果没有了科学，我们势必会更加贫困。给种族主义罩上科学的光环有其好处，不论是为了掌控当时所谓的不断上升的知识分子力量，还是为极端而非零碎地解决种族“问题”寻找理由。正如人们常说的，援引寄生虫学术语蕴含着无情的逻辑和极端性，而纯净的热情常见于那些在“铁血时代”举起“铁扫帚”扫清这世界上的种族污染的人们中间。这就是以宗教方式构想的、政治需要完成的生物学使命。

但正因希特勒回避了农民们毫无温情的民间反犹偏见，所以作为自诩的“艺术家”，他需要寻找一种比陈腐而抽象的学术思想更有包容性的东西。根据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兰德的观点，希特勒吸收了生物学中物种退化与纯化的观念，用于描述宗教

上的毁灭和救赎，这一观点确实独树一帜。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崇拜者圈子内，希特勒找到了一群附庸风雅的小精英集团，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宣扬他的这种大杂烩，即用雅利安-日耳曼文明来救赎希腊-罗马文明，强调无犹太人的或去东方化的基督教，并引导人民进入“新的、灿烂、光明的未来”，只有从黑暗中走来的犹太人能够阻止这一未来的降临。一种变异的、种族主义化的、排除了德国“犹太”元素的、清除了人文情感（罪恶和怜悯）的基督教，的确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纳粹主义不仅是科学所运转的暴动，不论这一定义多么适用于现代遗传学；也不仅是不纯正的基督教，不论这种说法多么适合那些将纳粹主义看作教会反犹太主义副产品的人们。它是二者创造性的组合。用其宗教科学武装起来，希特勒不仅变成了现代罗伯特·科赫或路易·巴斯德，热衷于消灭致命的病原体，而这种病原体恰恰是和他一样的人类；也变成了上帝的伙伴，并使他所关注的那群人类更加完善。人们可以指出纳粹变得狂傲的时刻——人们可能会说那是1941年12月做出入侵苏联进而占领美国的决策——但有必要认识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希特勒在政治上一直都狂傲不羁。

就这些现象进行写作还有另一个强大的传统，即通过极权主义对其进行分析。对许多评论家和学者而言，这仍是描述纳粹的绝佳途径，因为它渴望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恐怖来确定社会存在和终极意义。我也赞同这种观点。极权主义中“主义”二字平淡无奇，但“极权”二字却牢牢地扣住了这一政治形式的无法满足的侵略性特征：它极端仇视个体、自由、自治公民社会和法治。传统的专制政权背离民主迈出了一步，如禁止工会；与此不同的是，极权主义政权却迈出了两步，譬如组建伪工会，工人们必须先与这样的工会斗争，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从雇主手中争取自身权利。尽管30年来，学界一直试图废止“极权主义”一词，但对于有志于探究事物表象之下深层心理的人们而言，该词仍是个有用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简史大致是这样的。它开始流行于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右翼知识分子圈内，其成员倡导建立一个新的、高度集中的、永久动员的国家形态，以对抗一种所谓威胁要将其吞没的现代“社会”分裂及软弱的特质。该词语在法西斯的意大利要比纳粹德国使用得更为广泛，因为德国更加强调民族与动态“运动”而不是状态。反映这些原则的政权的出现，使民主国家的评论者对其愈加关注。1929年伦敦《泰晤士报》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描述对自由民主的日益背弃；10年后，在美国召开了首届关于极权主义的研讨会，此时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似乎刚刚证实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不道德的联系，而西方则被迫与一个被丘吉尔所称的恶魔般的大国建立联盟。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巧妙捕捉到了这一辛辣讽刺：当外围党迅速地将大洋国对欧亚国的战争转换为共产党命令的针对东亚国的战争时，确信前一场战争已被从记忆中抹掉了。当意识形态的列车轰鸣转向时，在极权主义的欧洲新闻界，人们也

可以同样毫不费力地转换观念。

《一九八四》这本书的目的是警告那些与极权主义暧昧不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如小说中不道德的审问者奥勃良所表现的，对他而言权力已成为一种宗教。但该书也捍卫了几近消亡的中产阶级生活——充斥着书籍、艺术品和美酒，但从该书表面看来，社会主义者奥威尔甚至对无产阶级充满信心。这个正派而体面的世界，随着悬挂着一串精美珊瑚的玻璃镇纸的粉碎而瓦解了。奥勃良解释了这种哲学的本质：“一直以来，每时每刻都会有胜利带来的激动，那是践踏无助的敌人时的满足，如果你想看未来的画面，那就想象一只皮靴踩在人的脸上，永远如此。”披着普世善良的外衣，将资产阶级罪恶系统化，自我憎恶，仇恨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唯我论、半部落式的对一个种族或民族膜拜的法西斯主义一样，都仇视文明社会中的正派、审慎、法律与秩序，并且公开宣扬暴力。

20世纪40年代末，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年）转而投入该问题的研究，不过她高度浓缩的研究成果难以和简洁的思想与行文相比。部分原因是她收集了十余年来一直感兴趣的大量零碎话题，并决定从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将苏联问题杂糅进去。她创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方法大有缺陷，不论是不加区分地批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保守地指责使用原子弹、暴民与群众；由于阿伦特喜欢同时冒犯一切政府机构，结果树敌太多，往往举步维艰。

阿伦特从一个大主题大胆地跳跃到下一个主题；从震惊于遭遇文明世界野蛮人的南非布尔人用种族教条自我隔绝加以对抗，到大英帝国官僚机构，但她都难以确切证明这些主题与德国极权主义有何关联。阿伦特坚信极权主义并非出自欧洲上层文化，因此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孤立的欧洲人被从法律、责任和传统束缚中解救出来，就对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如果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尽管丰富多样，但积极而又并不过于血腥，那么她的描述就包含核心的真理：战时的东欧和苏联如同无法无天的无人之地，文明人已退化为半人半兽的掠食者。但是这种关联还是不甚明显。阿伦特还极力反对德国存在一条独立走向现代的历史道路的观点，而赞成将之与欧洲文明的进程截然分开，仿佛希特勒只是来自火星的访客。她本身正是这样自以为远离文明世界的民族的产物，那么她怎么可能产生与此相悖的观点呢？被许多人看作自恋而珍贵的文献都是建立在德国是“文化国家”这个古老的悖论基础上的，而这一观点让其邻国难以接受。

但是瑕不掩瑜，该书中也有深刻的见识。阿伦特认为法治居于自由社会的核心，她用了一个悖论表达这一思想：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即使人们犯罪，但当他们可以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恐怖地狱中被置于超越法律的地位时，他们的处境还是要比普通入、难民或集中营中的囚犯更为安全。她还捕捉到了极权主义梦魇般的特征。极权主

义统治之下，人们不因愤怒和实用主义的算计，而纯粹因为历史的印痕或种族法律原因而被处死。苦难由人的类别决定，与每个受害者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人们的等级可以无限制地重新定义或补充。由于永远需要警钟与敌人，确定了其恐怖经济的过度膨胀，现实被残暴地加以修正以适应理论上的合理世界。内部好战核心人物的深奥观点掩藏于普通同情者之内，他们中间搭起了一条启蒙的天梯，直通带领他们前进的“神人”，神人寄予的支持让内部核心人物产生了他们植根于平凡大众的幻象。本书中探讨人种改良、反犹主义和战时种族大屠杀的章节，将会说明这种心态产生的后果。

极权主义理论从未与政治宗教理论发生冲突，甚至极权主义理论家雷蒙·阿龙、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卡尔·弗雷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都曾将二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政治宗教涉及的是人类经验中的更深层次，与此相关的理论试图解释宗教形式与情感究竟如何为了政治目的而得以复制；而极权主义理论注重处理更加现代的现象，其中现代国家的创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现代国家的科技进展已将过去的敌托邦与乌托邦幻想变为可能。

政治宗教与极权主义被雅各布·塔尔蒙加以最为系统化的融合，虽然有评论家称塔尔蒙的重要作品本身由于缺乏冷门与回旋余地，而更显近似极权主义大厦。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托克维尔追寻民主专制统治源头的启发。塔尔蒙将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他认为支撑了数个激进事业的革命救赎心态，他认为这一心态是将“合理世界”强加于现实之上。他的研究从卢梭和人们的一般愿望开始。前者颇有争议，后者不容置疑；而更加直截了当地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他们更为疯狂地将敌对的现实转换为他称的“他们的铅笔草图”的理论世界所使用的计谋终结。塔尔蒙认为，有远见的革命精英预测大众理想与历史方向，斩断他们普遍的幸福观，直到他们所创造的“幸福”将他们自己吞噬。他将这种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实用主义民主加以对比，认为两者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除对荷兰、英格兰、德国、苏格兰或弗吉尼亚启蒙运动缺乏兴趣外，还极大地低估了 18 世纪之前的议会民主对机构、思想和直觉所产生的影响，当时议会为征税或反抗君主侵犯早期的权利与特权提供了统一意见。但是，塔尔蒙是有思想的人，而不仅是关心特权与税收的人。他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他对民族主义各种世界大同的“各国之春”言之甚少，却更倾向于强调民族主义的种族排他性与救世主形式，并将之与他一直感兴趣的极权主义民主的更加国际主义的格调加以融合。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极权主义理论并非始终围绕极权主义国家的静态模型，并非编制某种识别特征对照表——与之对照学者们就可以认定某一政权是否属于极权主义政权。某些人采取了这种方式，也取得了中肯的成果，但即使他们列举了共同

症状，他们所做的也聊胜于对此的简单分类。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可能欣赏如此分类，但研究极权主义政权的文献还包括阿图尔·克斯特勒、乔治·奥威尔、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的作品。他们的途径更具想象力。这些研究途径都并不缺乏对这些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权之间的重要区别的认识，即使有时人们会说，在表面敌对的意识形态之下，存在着隐藏的亲密关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雷蒙·阿龙，他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别，但是他并未抛弃极权主义，将之用作描述二者相似之处的途径，即拥有“宏大抱负，激进态度和采取极端方式”。不过，他还慎重地补充道：“对于苏维埃的行径，我会重申这个古老的公式：想要制造天使的人，却造就了恶魔；对于纳粹的作为：人不应该模仿掠食的野兽，因为模仿野兽，就会变成野兽。”卡尔·弗雷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探讨极权主义政权“基本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人们也不应认定，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描述包罗万有的政治热情已因下列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合时宜：现代学者就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得出的新发现；政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摩擦；互有重叠的官僚职能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正如伦纳德·夏皮罗早在1972年写到的：“逐渐发生作用，如同某种恶性肿瘤，将政府和社会的一切纤维消磨殆尽。”毕竟，关注极权主义的作者群体都阅读过当代结构主义史学圣贤的作品，不过没感觉到有大幅修正其结论的必要。

最后，极权主义理论也不仅是西方冷战思维的产物——仿佛历史学家只是中央情报局或军情六处的学术武器。那些影射这种联系的人们是否是在捍卫屠杀了数千万人的政权？这些理论在冷战之前就有其前身，而且不论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或仅不自觉地使用该词的作品，在冷战结束十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一系列抱有不同政治理念的评论家和学者都曾使用该术语，仅随机列举某些知名人士：奥默·巴尔托弗、阿兰·贝桑松、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斯特凡·库尔图瓦、理查德·克兰普顿、罗伯特·康奎斯特、诺曼·戴维斯、伊什特万·戴阿克、弗朗索瓦·菲雷、蒂莫西·加顿·阿什、埃米利奥·让蒂勒、乌尔里希·赫伯特、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克劳德·勒福尔、马丁·玛利亚、小巴林顿·穆尔、杰里米·诺克斯、弗里茨·斯特恩、茨维坦·托多罗夫、安杰伊·瓦利基和阿米尔·韦纳。

面对纳粹德国整体研究的工业化规模的文献，将纳粹德国作为政治宗教或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而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形见绌。本书中某一章的课题已成为5.5万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其他相关章节的研究密度也与此相近。如此庞大的工作需要拥有独立的编史指南，虽然这并不足以取代经典文献。本书并不寻求完全推倒前人，也无意做出更大覆盖面的诠释，而是要见证对于政治宗教与极权主义概念不断积累的洞见，在